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

汪高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

汪高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 / 汪高鑫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 12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2005 - 1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经学 - 关系 - 史学 - 中国 - 古代 IV. ①Z126.272②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134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450016 电话:6578807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数 82 千字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

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

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

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

郑 林 周文玖

序 言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

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

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除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通古察今”系列丛书。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篇幅虽小，然问题意识明显，学术视野尤为开阔。希冀它的出版，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9年1月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 \ 4

- 一、先秦“六经”的亦经亦史特点 \ 5
- 二、汉代经史分离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 12
- 三、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兴起与史学的玄化倾向 \ 17
- 四、隋唐经史总结与疑古惑经思潮 \ 21
- 五、宋明理学的兴起与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 26
- 六、清代经史之学的嬗变 \ 30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经史尊卑论 \ 37

- 一、《汉志》“史附于经”问题 \ 38
- 二、宋代“荣经陋史”观问题 \ 44
- 三、明清“六经皆史”说问题 \ 52

第三章 刘歆的古文经学与班固史学 \ 68

一、刘歆的《七略》与《汉志》的编纂 \ 69

二、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与班固的历史思想 \ 94

第四章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 \ 115

——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一、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史学近代化的思想启蒙 \ 116

二、崔适由经入史：今文经学近代转向的开始 \ 126

三、梁启超的《新史学》：近代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 131

四、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今文经学与进化论的糅合 \ 136

第五章 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 \ 143

——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

一、章太炎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 \ 144

二、刘师培对构建新史学的贡献 \ 160

参考书目 \ 171

前言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经学在两千年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一直是作为官方学术思想与统治意识形态，对其他学术思想发生着重要影响；中国又是一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度，史学非常发达，人们通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代浩繁的史籍。经史之间的因缘颇深，从学术源头来讲，先秦“六经”元典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从秦汉以后的学术发展来看，经史之间明显存在着相互影响，汉代史学的分离与崇经意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玄化倾向、宋明史学的义理化倾向等等，都是这种因缘的体现。正是由于经学的官学地位和普遍的重史意识，传统社会高度重视经史之学。学术史上出现的汉代“史

附于经”现象、宋代所谓的“荣经陋史”观念以及明清的“六经皆史”说等，虽然都是在讨论经史关系，却并不具有先经、尊经和后史、轻史的意识。

以汉代刘歆古文经学对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为例，从中可见经学之于史学的重要影响。班固所撰《汉书》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刘歆古文经学对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目录学上。刘歆编纂的《七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群书目录著作，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是通过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撰成的，由此开启了历代正史“艺文志”编纂的先例。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历史思想上。刘歆宣扬的五行相生说，以及由此构建的自伏羲以来的历史系统，对班固《汉书》影响很大。《汉书》接受了刘歆构建的自伏羲以来的历史系统，依据五行相生的原理大力宣扬“汉为尧后而为火德”的思想，以此论证汉皇朝的历史统绪和地位。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传统经学逐渐走向衰落，而伴随着经学的衰落则是学术的转向。一方面经学紧紧服务于晚清政治，积极倡导社会变革；而另一方面，随着对公羊朴素进化论的重新解释以及对西方资产阶

级进化论的引进，经学逐渐衰落并开始向史学转向。在晚清经学转向过程中，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经学研究，对于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而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的经史之学研究，则反映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同时，古文经学也实现了同步改造，即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代表人物便是章太炎和刘师培。与经学转向相对应，晚清史学也发生了转向，即由传统史学转向近代新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是这一时期体现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作。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

作为古代中国的两大显学——经学和史学，它们之间的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对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能缺少历史的说明和验证。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因缘，经史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历代学者津津乐道的问题。以下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经史之学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作出系统梳理，以期揭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先秦“六经”的亦经亦史特点

中国的经学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立五经博士而兴起，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学也因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撰成《史记》而成就史家的“一家之言”。以此计算，经史因缘已有 2100 余年之久。然就学术发展史而言，经学与史学又皆起源于先秦，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由于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才得以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从而逐渐形成经学；而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中的《尚书》《春秋》等典籍实为先秦史籍之源。“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表明，早在先秦经史起源时期二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观之，则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至少要追溯到孔子整理“六经”的春秋时期。

作为后世儒家经典专称的“经”，在先秦时期它的含义有一个演变和发展过程。“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金文，其本义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是“经，织从

丝也”^[1]。清人段玉裁注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2]，“经”是指编织的纵丝，因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古老纺织工艺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经”开始用来指称官府和诸子百家的基本典籍，如《释名·释典艺》所谓“经，径也，常典也”，像《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即是如此。作为典籍的“经”，在这一时期并不局限于只是对儒家经典的指称。不过，在这一时期能够得到普遍尊崇的经典，还属《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这六部经典并称为“六经”，始见于战国文献《庄子·天运》^[3]。此外，像《庄子·天下》《商君书·农战》和《荀子·儒效》等篇亦有记载。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称此“六经”为“六德”，而且排序如同《庄子·天运》^[4]，更是打消了人们对于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六经”的疑虑。但是，在《庄子》一书看来，“六经”只是有关古圣先

[1] “从丝”二字原文脱，清人段玉裁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六补。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3] 《庄子·天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4] 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六德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贤的经籍，是诸家皆称引的天下道术。^[1]

“六经”后来之所以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经典，追根求源，还是与孔子对它的整理和传习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周予同所说，“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2]。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最早作出明确记载的，当属《史记》的《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编次了《尚书》，删订了《诗经》，编定或修订了《礼》《乐》，作了《周易》的一部分，因鲁史而编写了《春秋》。对于这一说法，周予同认为“值得人们重视”，又指出它“显然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因而后来的经学家，并不都以为他的说法可信”^[3]。清季以来，甚至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有认为“六经”皆

[1] 《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2]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02 页。

[3]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96 页。

为孔子所作，亦有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1]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六经”绝非一时一人之作，这从“六经”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便可了然；“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上古三代历史文化典籍，孔子以“六经”作为教材教授弟子^[2]，出于教学的需要而对古老的“六经”传本有所删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果没有孔子对古老的“六经”传本的整理，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家学派的“六经”经典和经学了。当然，后世儒家基本经典，还有一个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唐代“十二经”，最后到宋明“十三经”的发

[1] 前者代表人物如皮锡瑞，参见其《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后者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参见其《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0页。

[2] 《史记》不但记载了孔子删编“六经”，而且认为孔子是以其作为开办私学的教材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展和演变过程^[1]，不过，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一直是其中的核心经典。而这些基本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时代里，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秦时期的“史”字出现很早，最初的含义是指史官，赋予其史籍之义则是较晚的事情。白寿彝先生说：“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2]不过，我们这里的关注点并不是古人什么时候赋予了“史”字以史籍的含义，而是先秦时期的史籍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最初的史籍又有哪些，它们与经籍有何关系。从逻辑上说，有了史官，便有了历史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册”“典”，便是商代史官记录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在春秋以

[1] 汉代设“五经”博士，其“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没有《乐经》。关于《乐经》的亡佚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亡于秦火，二是认为“乐”本无经，只是附于《诗经》的乐谱。不过，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已有与《庄子》所记完全相同的“六经”之名，可以证明后一说法并不正确。到了唐代后期，儒家“五经”已扩大为“十二经”，除了《易》《书》《诗》三经外，《礼》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有《公羊》《穀梁》和《左传》“三传”，外加《论语》《孝经》和《尔雅》。宋明时期，随着孟子儒学地位的提高，又增添了《孟子》一书，于是有了“十三经”之说。

[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